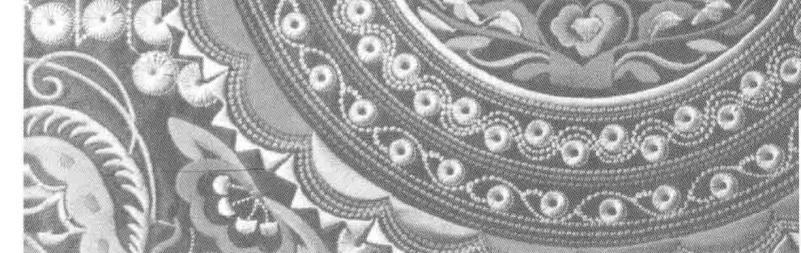




社会转型期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研究

吴德群著



社会转型期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研究

吴德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转型期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研究 / 吴德群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6

ISBN 978 - 7 - 5203 - 0448 - 1

I. ①社… II. ①吴… III. ①壮族—俗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281.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732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丽

责任校对 同萃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19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社会转型期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研究，
项目批准号：10CSH019；结项证书号：20161180）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一 研究缘起与研究的问题	(1)
二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5)
三 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13)
第二章 文献回顾	(18)
一 文化变迁理论	(18)
二 社会转型期壮族民间文化研究	(29)
第三章 壮族社会转型与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特征	(59)
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壮族社会转型	(59)
二 转型期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现状	(72)
三 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特征	(126)
第四章 现代性与个体能动性: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动力	(142)
一 现代性与壮族民间文化变迁	(142)
二 个体能动者对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影响	(162)
三 对壮族民间文化变迁动力的多维解读	(172)
第五章 转型期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过程	(176)
一 第一阶段(1978—1991):国家引导下的恢复与发展	(177)
二 第二阶段(1992年至今):国家、社会、市场三者博弈中 变迁	(185)
第六章 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趋势	(192)
一 壮族民间文化基础和文化功能渐趋弱化	(192)

二 壮族文化精英和壮族民间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意识将日益增强	(199)
三 壮族民间文化的现代化步伐将逐渐加快	(204)
四 对壮族民间文化变迁过程与趋势的理论解读	(205)
第七章 壮族民间文化变迁背景下的文化震荡与文化适应 (208)	
一 概念、问题与研究方法	(208)
二 壮族民间文化变迁引起的文化震荡	(211)
三 壮族民间个体的文化适应	(215)
四 减轻文化震荡,保持传统与现代间连续性的可能与路径	(221)
第八章 转型期国家及地方政府引导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实践与壮族民间社会态度 (225)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框架下的壮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	(225)
二 民间社会的态度	(247)
三 对国家和地方政府引导壮族民间文化变迁实践的理论反思	(254)
第九章 壮族民间文化保护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256)	
一 壮族民间文化保护面临的困境	(256)
二 转型期保护壮族民间文化,引导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对策	(268)
参考文献	(274)
附录 1:社会转型期壮族民间文化变迁调查问卷	(291)
附录 2:社会转型期壮族民间文化变迁访谈提纲	(301)

第一章

引　　言

一　研究缘起与研究的问题

笔者之所以研究壮族民间文化变迁这一问题，主要有三个缘由。一是源于笔者对壮族山歌文化的好奇及对其衰落的惋惜，也是笔者对壮族山歌文化思考的自然延伸；二是出于感动和对壮族人的感激；三是源于对壮族民间文化历史贡献及其现实处境的思考。

先说第一个缘由。笔者对壮族山歌产生好奇，始于2003年。当时，笔者在广西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住在大学生公寓城。一天，突然从宿舍里飘出一阵熟悉而又陌生的歌声：是几个同学在合唱。之所以说熟悉，是因为笔者曾经听过此歌；之所以说陌生，是因为笔者当时怎么也想不起那究竟是什么歌。经过吃力的记忆搜索，笔者才想起原来那歌就是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刘三姐》中的插曲《山歌好比春江水》。^①突如其来的声音让笔者倍感兴奋和惊喜。笔者如梦初醒般地意识到，原来自己竟身处具有“歌海”美誉的壮乡。久违的歌声不仅激活了笔者关于壮族山歌的美好回忆，还激发了笔者对壮族山歌的好奇。正是那阵偶然的歌声，使笔者开始关注山歌。

^① 根据林雪娜、何振强的查证，《山歌好比春江水》并不是1961年在全国上映的电影《刘三姐》中的歌曲，而是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广西民间歌舞剧《刘三姐》的序曲和主题曲。林雪娜、何振强认为，尽管20世纪70年代广西民间歌舞剧《刘三姐》被拍摄成舞台艺术，但是由于电影《刘三姐》影响更加广泛，因而造成很多人误认为《山歌好比春江水》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参见林雪娜、何振强《刘三姐寻源：〈山歌好比春江水〉词曲原创在哪？》，《广西政协报》2011年4月30日第001版。这或许也是笔者有上述记忆的原因。

那时，桂林七星公园旁边，有一个小歌圩。笔者对山歌实况的体验，就是从身临这个歌圩开始。每逢星期天，都会有一些老人到歌圩对唱山歌或唱歌。老人们多来自桂林市周边的村子。他们通常都自带凳子，三五成群，一大早步行到歌圩，天黑时又步行回家。当笔者真正在歌圩中听到山歌的时候，才知道山歌并不像电影《刘三姐》中的山歌那么好听。因为，就笔者听来，山歌不仅调子单一，没有乐器伴奏，更主要的原因是，笔者根本听不懂山歌。但老人们对山歌的热情和痴迷，却感染着笔者，并激发了笔者试图探寻山歌奥秘和理解山歌魅力的冲动。与其说笔者是对山歌感到好奇，不如说是对这些唱歌的老人们感到好奇。

硕士毕业后，笔者留在壮乡百色工作。2007年大年初一，笔者到百色市森林公园游玩，一进公园，就被公园中对唱山歌的“歌海”场面所震撼。成百上千的对歌人聚满了整个公园。歌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第一次亲临歌海，笔者不仅目睹了“歌海”的盛况，而且感受到壮族山歌与壮族人的密切关系。带着对壮族山歌与壮族人关系的思考，笔者在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选择了壮族山歌与人的社会化这一论题。

在研究壮族山歌的过程中，随着对壮族山歌认识的逐渐加深，笔者对壮族山歌及唱歌者的好奇感逐渐淡化，随之增强的却是对壮族山歌文化逐渐衰落的惋惜。因为，在观察和访谈过程中，笔者感到山歌已渐行渐远。年轻人，尤其是少年儿童不仅已不会唱山歌，甚至已听不懂山歌。笔者在调查研究中所听见的多数已是老人们关于山歌生活的昔日回忆！美好的回忆，一方面令言者怀想留恋，另一方面也令听者惋惜。

作为壮族民间文化典型的壮族山歌的衰落，在令笔者惋惜的同时，也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在商业大潮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在壮族社会结构急剧转型的当下，壮族民间文化处境究竟如何？

再说第二个缘由。思考壮族民间文化变迁，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笔者对壮族人民充满感激。自2003年至今十余年，笔者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广西，生活在壮乡。在壮乡，笔者获得了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机会；硕士毕业后，又在壮乡获得了工作机会，成为一名高校教师，成就了笔者的教师梦；在壮乡，笔者以少数民族骨干人才的身份，获得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在壮乡，笔者获得了专业技术高级职称；也是在壮乡，笔者的妻子不仅攻读了硕士研究生，而且成为一名工作在壮乡的大学教师。壮乡人民巨

大的恩惠让笔者满怀感激。不仅如此，长时间的壮乡生活，还让笔者深切感受到了壮乡人民的真诚朴实，热情乐观，勤劳坚强，自信包容，并为之深深感动。

2008年大年初一，或许是当时笔者的母亲卧病在床，笔者却与妻女留在百色，没能回家团聚；或许是身在异乡，佳节思亲的缘故，笔者的心情有些沉重。吃午饭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笔者打开门，原来是一位阿姨来给我家送粽子！三个粽子，大大的，沉甸甸的，热乎乎的，笔者至今难忘。笔者接过粽子，心中顿时充满了温暖，感动得不知所措！

2009年3月，笔者到那坡县果巴村作关于壮族山歌的入户访谈，当时就住在笔者的学生家里。其间，不仅得到学生家长的细心关照和热情款待，也得到了果巴村民的热情支持。入户访谈时，每到一家，主人都会热情地端上一碗自酿米酒给笔者喝。访谈结束时，学生的家长为了给笔者饯行和答谢各位被访者，将笔者访谈过的邻居们一起请到家里吃午饭。饭间，无论男女长幼，都相互对歌饮酒助兴。伴着歌声和笑声，午饭从中午12点左右开始，到下午3点多才结束。临别时，邻居们共同举杯，向笔者敬酒，并以歌辞别：

再见了
东家祖宗
我俩暂离别
以后再相见
再见了
东家父母
我俩暂离别
以后再相见
再见了同桌同排
我俩今日暂分别
今日分别各两方
不知哪年再相见
别了，老师，暂别了
莫嫌我们家里穷

多住几天你再走
 不要忘记我们啊
 以后有机会再来
 暂别了，亲朋好友
 以后有机会再来^①

看着门外高耸绵延的群山，想着唱歌者的常年辛苦劳作和他们山一般的坚强，感受着他们的热情、朴实、善良与真诚，听着这悠长高亢并带几分伤感的旋律，笔者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些感激与感动，都是从壮乡人那里获得的，是从壮族独特的民间文化中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感动与感激的驱动，笔者才为这些美好民间文化的衰落感到焦虑和不舍。正是这种不舍，驱使着笔者思考壮族民间文化的变迁。

之所以研究转型期壮族民间文化的变迁问题，还有第三个缘由，那就是在壮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壮族民间文化正面临着衰落的挑战。壮族是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壮族民间文化在壮族人民反抗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抵御外敌入侵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和保护生态环境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期，壮族民间文化又在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尤其是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兴建和泛北部湾开发步伐的加快，壮族社会由传统的文化边缘被推向全球文化交融的前沿，壮族民间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在此背景下，关注壮族民间文化的变迁，理解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规律，把握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动力、方向、过程、趋势，思考引导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对策，迫在眉睫。

基于上述缘由和背景，本书努力思考和试图回答：社会转型期，壮族民间文化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壮族民间文化变迁具有怎样的特征？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动力何在？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壮族民间

^① 吴德群：《壮族山歌与人的社会化——以认知和情感为视角》，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8 页。

文化变迁的趋势怎样？壮族民间文化变迁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引导壮族民间文化变迁过程中面临哪些困难？应该怎样引导壮族民间文化变迁？

二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概念界定

本书涉及以下主要概念：社会转型与社会转型期，广西、壮族与壮族地区，民间文化、壮族民间文化和文化变迁。

1. 社会转型与社会转型期

就国内而言，郑杭生先生是较早界定社会转型概念的学者。他关于社会转型的表述是“‘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①。这一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指社会的生产模式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概括的理解即工业化；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指社会生活由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向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转变，即城市化；三是社会关系性质的转变，指社会结构的不同地位或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封闭关系向现代的开放关系转变，社会流动——尤其是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渠道更加畅通。

郑杭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正式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迄今为止，中国社会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840—1949年）；第二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1949—1978年）；第三阶段是从改革开放至今（1978年至今）。郑杭生先生同时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即具有不同的“社会转型度”。社会转型度，是郑杭生先生提出的用来理解社会转型特点的概念，包括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维度。运用上述

^① 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五个维度，郑杭生先生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阶段进行了比较认为，较前两个转型阶段，第三个阶段的转型具有快速、全面、深层、利益大、调整难、建设难等特征。其价值向度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因此，他将第三阶段也称为“社会转型加速期”。^①

尽管郑杭生先生没有明确说明社会转型期的确切内涵，但从他关于社会转型内容和表现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转型期实际上就是特指1978年以来，即改革开放至今这一时期。“与改革开放前，即1979年前相比，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社会的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社会学视角看，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在各个方面上的表现。”^②这段表述表明，社会转型，实际上指的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相应地，社会转型期指的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加速转型这一特定阶段。

本书中的社会转型期，指的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

2. 广西、壮族与壮族地区

广西，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即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中国西南，位于东经 $104^{\circ}28' \sim 112^{\circ}04'$ ，北纬 $20^{\circ}54' \sim 26^{\circ}23'$ ，南接北部湾，与海南省相邻，东邻广东省，东北接湖南，西北邻贵州，西邻云南，西南与越南人民共和国接壤。行政区域总面积23.6万平方千米。广西壮族自治区内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仡佬、回、京、彝、水等多个民族。^③

广西历史悠久。秦朝时期，广西属布政司，设桂林郡，下辖桂林府、柳州府、庆远府、思恩府、泗城府、平乐府、梧州府、浔州府、南宁府、太平府、镇安府、玉林府12府；唐朝时，广西属岭南道，分设岭南西道。宋朝设广南路。元朝先设广西等处宣慰司，隶属湖广行省，后设广西等

^① 郑杭生：《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② 同上。

^③ 何成学、樊东方：《广西改革开放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处行中书省。明朝洪武九年设广西布政使司。^①

从空间上看，清朝时期，广西属京师布政使司。所辖疆域东至桂林府灌阳县，与湖南永州接壤，西至泗州府西隆州，与贵州普安相邻；南至梧州府岑溪县，与广东信宜交界，北至桂林龙胜县，与湖南城步县相邻；东南至梧州怀集县凤岗堡；西北至桂林龙胜与湖南相邻；东北至全州与湖南东安相邻。西南至太平府思陵土州接交趾高榜夷州、西陵县与云南广南相邻；镇安府与云南富州相邻。东西相距2920里，南北相距1465里。^②至嘉庆二十五年，广西疆域除怀集县今改属广东，今北海、钦州、合浦、防城、浦北、灵山和邕宁等市县（自治县）当时属广东而不属今广西外，与今广西疆域基本相同。民国时期疆域与清朝基本相同。但设置有所简化，至民国三十七年，仅有市、县两种设置类型。^③

1950年，广西解放。同年2月8日，广西省人民政府成立，下设龙州、百色、桂林、柳州、平乐、南宁、宜山、武鸣、梧州、玉林10个专署和南宁、梧州、桂林、柳州4个市。^④

1958年3月5—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撤销广西省建制。^⑤首府设在南宁。

2002年年末，广西全区设立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崇左14个地级市，76个县（包括县级市、县和自治县）。^⑥

壮族（壮语：Bouxcuengh），是岭南土生土长的民族。壮族由百越人中的西瓯、骆越发展而来。在唐朝，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壮族雏形已形

^① （清）谢启昆修，（清）胡虔纂：《广西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12页。

^② 沈秉成：《广西省广西通志辑要》（全），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7页。

^③ 雷坚：《广西建置沿革考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8页。

^④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广西解放》，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458页。

^⑤ 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广西壮族自治区50年纪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⑥ 廖新华，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等：《百年广西工业1840—2002》，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成。北宋侬志高起兵反宋，标志着壮族实体基本形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他民族对壮族有过不同的称谓。自秦至唐，壮族先民曾分别被称为西瓯、骆越、蛮、俚、乌浒、僚等。宋朝之后又出现土人、僮、沙人或沙蛮、依人、俍等称谓；^① 新中国成立之后，壮族统称为“僮族”。1965年周恩来总理建议改“僮”为“壮”，“僮族”改为“壮族”，壮族称谓由此统一。^②

壮族地区，作为一个概念，较少见完整统一的定义。有关于壮族地区的表述，主要是根据壮族人口的集中程度来划分的。例如，特指广西区内的“壮族地区”表述：“指 2002 年广西行政区划未变动前的壮族人口聚居的南宁、柳州、河池、百色四个地区以及南宁、柳州两个市（含市辖县）；2002 年行政区划变动后，按 2005 年行政区划为南宁、柳州、百色、河池、来宾、崇左 6 个市所辖的县、区。简称‘壮族地区’。”^③

上述特指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壮族地区定义，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作为壮族地区的一般定义。因为，从人口分布的角度来说，广西尽管是壮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地区，但除了广西，其他省份也有壮族人口的大量聚居区。特别是云南和广东，还有贵州、湖南和海南，均有大量的壮族人口聚居。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例，全国共有壮族人口 16926381 人，全国 31 个省（区）、市都有分布。其中，广西的壮族人口为 14448422 人，占全国壮族人口的 85.36%；云南有壮族人口 1215260 人，占壮族总人口的 7.18%，广东有壮族人口 877509 人，占壮族人口总数的 5.18%。广西、云南和广东三省的壮族人口占全国壮族总人口的 97.72%。贵州有壮族人口 52577 人，占壮族总人口的 0.31%，湖南有壮族人口 30387，占壮族总人口的 0.18%；海南有壮族人口 45909 人，占壮族总人口的 0.27%。值得强调的是，浙江的壮族人口已达到 72820 人，超过了贵州的壮族人口数量（见表 1—1）。可见，若仅从人口比重来看，壮族地区至少应该包括广西、云南和广东。

^① 张声震：《壮族通史》（上、中、下），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2—294、575—581 页。

^② 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6 页。

^③ 肖永孜：《壮族人口》，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8 页。

表 1—1 全国壮族人口分布（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地区	人口数量	地区	人口数量
全国	16926381	河南	5361
北京	14994	湖北	12240
天津	6123	湖南	30387
河北	17295	广东	877509
山西	2007	广西	14448422
内蒙古	2319	海南	45909
辽宁	4285	重庆	4634
吉林	1547	四川	10050
黑龙江	2070	贵州	52577
上海	16219	云南	1215260
江苏	20880	西藏	173
浙江	72820	陕西	3555
安徽	6998	甘肃	1647
福建	29696	青海	980
江西	7979	宁夏	977
山东	5822	新疆	5646

注：本表数据来源于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卷，概要 1—6：各地区分性别、民族的人口。

民族区域，作为一个民族学概念，除了要考虑民族人口分布的状况外，还应考虑民族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历史稳定性。在这一点上，壮族地区的划分，可以从壮族文化的区域分类中得到启发。梁庭望教授认为，壮族人口分布区域广大，具有跨省而居的特点，因而形成了区域性文化。梁教授将壮族文化区域划分为 9 个板块：红水河中下游文化区、柳江龙江文化区、桂西北文化区、桂粤湘文化区、邕江右江文化区、左江文化区、邕南文化区、桂边文化区和文山文化区。^① 文化区及其所属范围详见表 1—2。

^① 梁庭望：《壮族文化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23 页。

表 1—2 壮族文化的 9 个区域板块

文化区类型	文化区范围
红水河中下游文化区	桂平、武宣、贵港、上林、马山、都安、来宾县红水河以南
柳江龙江文化区	象州、荔浦、阳朔、永福、鹿寨、柳州市、柳江、来宾、忻城、宜山、合山
桂西北文化区	龙胜、三江、融水、融安、罗城、环江、南丹、天峨、东兰
桂粤湘文化区	贺县、钟山、富川、恭城、广东连山、湖南江华
邕南文化区	邕宁南、扶绥、上思、防城、钦州、灵山、合浦
邕江右江文化区	横县、宾阳、邕北、武鸣、隆安、平果、田东、田阳、百色
左江文化区	崇左、宁明、凭祥、龙州、大新、天等、德保、靖西、那坡
桂边文化区	田林、西林、隆林、凌云、凤山、乐业等县
文山文化区	富宁、广南、邱北、砚山、西畴、文山、麻栗坡、马关

注：本表根据梁庭望教授关于壮族文化区域类型的划分整理。梁庭望：《壮族文化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从梁庭望教授关于壮族文化的区域划分可以看出，9 个壮族文化板块跨越了广西、云南、广东和湖南四省区。除了文山文化区属云南、桂粤湘文化区部分在广东和湖南外，其余 7 个文化区均在广西境内。

综合壮族人口分布和壮族文化的区域特点两个方面，本书的壮族地区指的是广西壮族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及云南的文山文化区、桂粤湘文化区中的广东连山和湖南江华一带的壮族人口聚集区。

3. 民间文化与壮族民间文化

民间，按照钟敬文先生的理解，“指民众中间，它对应官方而言，概而言之，除统治集团机构以外，都可称作民间。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广大中、下层民众”^①。与这种社会分层相对应，钟先生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三类：封建地主阶级创造和享有的上层文化，城市商业市民创造和享有的中层文化和广大农民创造和享有的底层文化。^②按此理解，民间应包括城市商业市民和农民两个社会阶层，而民间文化指的是城市商业市民阶层的文化和农民阶层的文化。在后来的研究

^①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 页。

^② 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 页。

中，文化分类的概念被调整，钟先生的三类文化概念分别被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概念所取代，相应地，民间文化的外延缩小，仅指“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①

本书中的壮族民间特指壮族农民，而壮族民间文化，特指壮族农民所创造、实践和传承的传统文化。

但从外延上看，壮族民间文化却非常广泛。从既有文献来看，民间文化通常被归入民俗学范畴，民间文化的分类也因此与民俗事象的分类相一致。参照民俗学对民俗事象的分类，民间文化相应地可划归为四类：民间物质文化、民间社会文化、民间精神文化和民间语言文化。其中，民间物质文化主要包括民间生产、民间商贸、民间饮食、民间服饰、民居、民间交通和民间医药保健，即民间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民间社会文化包括民间组织、民间社会制度、岁时节日和民间娱乐；民间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巫术、民间哲学伦理和民间艺术；民间语言文化主要包括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学。^②

鉴于壮族民间文化包含了不同的文化层面，涉及不同的文化特质，而不同层面和不同特质的文化，变迁规律不尽相同，例如，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变迁的速度上就存在差异，因此，本书在论及壮族民间文化变迁的不同问题时，为了论述方便，通常会以壮族民间文化的某个层面或特质为例进行说明。

4. 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关心的问题。由于二者所理解的文化概念不同，因而理解文化变迁的角度也有差异。人类学将人类活动的几乎一切方面都称为文化。典型代表就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泰勒将文化理解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③。在人类学那里，社会被包含在文化之中：“社会群体以及各社会群

^① 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②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③ [英] 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